

跨越“中希大峡谷”： 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可能

李怀印

摘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3000 至 20000 美元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关键区间，目前仅有少数国家位于这一区间。不同于长期置身中等收入陷阱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规模优势、人力优势和体制优势，将有可能在 2035 年之前成功跨越这一区间，加入发达国家行列，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依赖西方霸权的扶持，并且在摆脱西方霸权支配的基础上，凭借自身力量走完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西方霸权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或解构。但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所完成的现代化，必将意味着对自从 19 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性超越。

关键词：中希大峡谷 现代化 地缘政治 大国竞争

“现代化”视野下的世界地图

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如果用人均 GDP 来表述，在 21 世纪 20 年代初，这个鸿沟大致就是 20000 美元以上与 13000 美元以下之间的差距。这里不妨把这条鸿沟称做“中希大峡谷”（Sino-Greek Canyon），因为希腊的人均 GDP 刚好 2 万美元，在中等规模以上的发达国家中垫底。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 13000 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且最具继续攀升的势头。

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摆脱“低收入”（人均 GDP 在 800 美元以下）和“低中收入”（2600 美元以下）的状态，加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 2600 至 6000 美元）并不难，至 2021 年已经有 38 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其中最低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为 2672 美元；

最高的是厄瓜多尔，5965 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上升到“上中收入”国家（人均在 6000 至 13000 美元之间）虽然困难些，但也不是不可能，到 2021 年已经有 39 个这样的国家，其中，人均 GDP 最低的是哥伦比亚，为 6104 美元；最高的是中国，为 12556 美元。

再往上就是 13000 美元至 20000 美元的区间，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希大峡谷。位于这一区间的国家少之又少，如果剔除人口不到 500 万甚至只有十几万的小国（如塞舌尔、巴巴多斯、乌拉圭、库拉索等 11 个国家），剩下的只有四个人口在 500 万以上的国家，即匈牙利（18728 美元）、波兰（17999 美元）、罗马尼亚（14858 美元）和智利（16265 美元）（见图 1）。^①

要穿越中希大峡谷，从 13000 美元跃升到 20000 美元，从而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非常之难。除非有特定的外围环境和内在条件，普通发

^① 以上数据（包括图表中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以截止到 2023 年 6 月，更新至 2021 年的最新数据为准。

展中国家很难逾越这条鸿沟。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成功跨过这一峡谷、实现全社会现代化的,只有两类国家和地区。其一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靠的是它们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美国在财政、技术、贸易、军事、政治上的全面扶植。当然,这类国家内部在“发展型政权”(developmental state)主导下所形成的外向型战略,以及当地民众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刻苦勤俭、崇文重教的价值观,也对工业化的成功起飞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① 其二是欧洲六小国,即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以及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因为较早加入欧盟(2004

年),文化上与已经现代化的西欧和北欧国家相近(基督新教路德宗或者罗马天主教),彼此地理上相邻,因此,在加入欧盟之后,很容易引进来自西北欧和南欧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技术,并且在金融和贸易体系方面与欧盟完全融合,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升级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而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比六小国大得多的其他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尽管也已经加入欧盟,但体量较大,很难一下子被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吸纳。不过,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上述东欧国家中已有三个(波、匈、罗)进入向发达国家的过渡地带(人均 GDP 在 13000 至 20000 美元之间)。它们能否成为下一波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员,尚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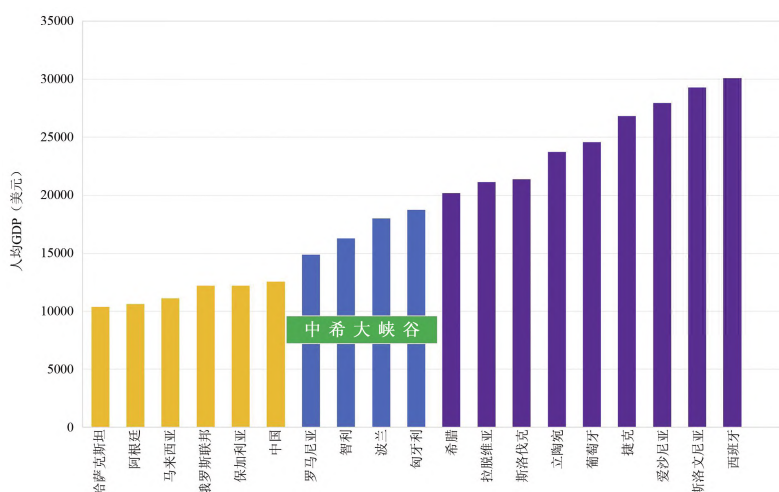


图1 上中收入国家至高收入国家的过渡分布(2021年)

中国的人均 GDP 在 2021 年达到 12500 多美元,在“上中收入”国家中名列前茅。问题是,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能否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跨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峡谷,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

后,从 2020 年开始,由于三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明显下滑,从过去年增 7% 乃至 10% 以上,跌至 2020 年的 2.2% 年,2021 年反弹至 8.1%,但是到 2022 年再次下滑到 3%;^② 2023 年估计也仅在 5% 左右。疫情的结束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势头的恢复;相反,伴随着经济增长

① 对战后日本“发展型国家”最具学术影响力的论述,见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关于文化传统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见 Lawrence Harrison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② 2020 年和 2021 年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2》,表 3—5,“国内生产总值指数”,<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2022 年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疲软乏力,各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在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也呈下降趋势。曾经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最主要来源和地方实体经济最主要支撑的房地产业,由于民众的购房意愿和还贷能力下降,也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前景似乎也黯淡下来。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 年上台之后,美国频繁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通过大幅提高关税,限制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2021 年拜登总统上台后,进一步强调在对外贸易上与中国“脱钩”,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还联手其在欧洲和东亚地区的盟国,在涉及 5G 通信、人工智能的尖端科技领域对中国展开制裁、断供和封锁。中国国内的高端芯片设计、研发和制造产业受到严重挫折。多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扩张的势头也减缓下来。到 2023 年上半年,中国已经从原先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下降到第三位,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① 基于这些新的情势,西方媒体已有言论认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覆辙,陷入长期萧条状态,甚至会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后尘,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经济学家原本认为,中国凭借其现有的增长势头,可望在 2035 年前后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现在这种前景已经变得遥遥无期,可能永远也赶不上。^②

的确,中国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有些是短期的、暂时的,包括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普通消费者减少开支和市场不景气现象。有些则是长期的体制性因素所引起的,尤其是多年以来一直构成地方财政主要支撑的房地产业,由于总体规模的过度扩张和商品房价格的严重泡沫,已经难以为继,而失去最大财源和融资渠道的地方各级政府,背负规

模庞大的地方债,也构成当地经济正常运转和扩张的最大隐忧。此外更有地缘政治环境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在中高端产业领域转型升级势头的联手打压,对中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和不可低估的。

尽管如此,中国拥有普通中小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系列大国优势。长远来看,这些优势对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仍将会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在所有中等规模以上(人口不低于 3000 万)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将最有条件率先穿越人均 GDP 在 13000 至 20000 美元的大峡谷,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完成全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的地缘优势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很糟,周边国家多对中国怀有戒备甚至敌意。持这种说法的,多来自美国,因为后者两边濒海,北边和南边的两大邻国,即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反观中国周边各国,其地缘环境恐怕并不好过中国。受美国霸权控制的日本,一直很难处理好与周边的中、朝、俄之间的关系。韩国直接面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印度则需要面对来自近邻巴基斯坦的敌意和核威胁。其实,相对于美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的地缘环境有其独特的优势。

其一,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数千年的历史,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无需像地域狭小、资源贫乏的欧洲国家那样,仰赖对外扩张、掠夺、殖民或海外贸易。这是因为中国的内地,尤其是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有广袤的平原,气候温润,土壤肥沃,适宜农耕。而千百年来形成的密集型农耕文化,使华夏民族能够以其有限的耕地繁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今

① Ken Roberts, “After 14 Years on Top, China Now Ranks Third for U. S. Imports”,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oberts/2023/07/11/after-14-years-on-top-china-now-ranks-third-for-us-imports/?sh=4bde67b57a41>.

② 例见 Simon Cox, “Will China’s Economy Ever Overtake America’s in Size?”, *The Economist*, No. 18, 2022; Stella Yifan Xie, “China’s Economy Won’t Overtake the US, Some Now Predic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 2022; David Wallace-Wells, “What Can Replace China as a Global Economic Engin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2023; Rick Newman, “China’s Economy May Never Eclipse America’s”, *Yahoo Finance*, August 21, 2023.

天的中国依然强调保护耕地,以密集型农耕方式,确保14亿人的粮食自给和生计安全。因此,即使今后发生极端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就是失去所有对外物质交流的渠道,中国依然可以凭靠本国的丰富资源和齐全的产业部门,维持整个民族的生存。对于那些已经被深度卷入全球化过程、高度仰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小型国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二,中国不仅具有粮食安全的优势,为民族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而且具有自然资源的优势,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强劲的支撑和坚实的基础。这主要归功于千百年来中原王朝的开拓、整合和华夏民族的同化、融合过程,从而形成东自整个长白山脉和大兴安岭,中间横跨内蒙古大草原,西至新疆腹地,往南涵盖整个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辽阔边疆。边疆地区地貌各异,环境多样,资源丰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木材、煤炭、石油、天然气、矿石、水电及各种矿物质和稀有金属,总体上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和全国经济建设的各项需要。尤其是在对尖端技术设备的制造不可或缺的稀土开采和稀有金属的生产方面,中国更是占据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

其三,中国的辽阔地域和地缘格局,为整个国家的防卫安全提供了世界各国当中独一无二的战略优势,这就是战略纵深和战略延伸的完美结合。先看战略纵深的优势。虽然中国70%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都集中在东部,也就是所谓的“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但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却为中国的国防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战略纵深。表面上看,西部地区地旷人稀,价值不大。在晚清海防与塞防两派的争论中,李鸿章即曾主张放弃新疆,将国家财力集中于沿海的防卫。谭嗣同更主张把“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全部卖掉,说这些地方“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①但清朝上层精英对西北的重要性始终看得十分清楚:从西藏、新疆到内外蒙古和东北地区,这条半弧形的边疆地带,构成了内地安全的重要屏障。没有内外蒙古,则京师不保,而没有新

疆和西藏,则内外蒙古的安全和向心力得不到保障。而在21世纪的当下,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大国竞争趋于激烈,在这个半弧形边疆地带制造混乱和离心倾向,也构成竞争对手制衡中国的必要杠杆。

西部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为东部提供了自然资源和安全屏障,在大国竞争趋于激烈并有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条件下,还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提供了机动的空间。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一旦东部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或战火摧毁,可以将人口和资源向胡焕庸线以西迁移,抗战时期的大西迁正是这一战略纵深优势的充分发挥。更不用说西部地区在尖端武器的研发和试验上所提供的纵深优势,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地理纵深,核武器的地上试验和远程打击力量的形成很难做到。

再看战略延伸的优势。中国独特的地缘格局为中国的国防安全 and 国家利益提供了朝海洋和内陆两个方向延伸的条件。就海洋方向的延伸而言,中国拥有由东海、黄海、南海三大水域所组成的辽阔海疆,不仅为陆地安全提供了海洋屏障,同时也为陆地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海上运输的方便。经由上述海疆,中国可以将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以海运的方式,延伸到整个太平洋西部,进而横跨印度洋抵达非洲和阿拉伯地区,跨越太平洋抵达南美地区。就内陆方向的延伸而言,从新疆地区可以将中国的影响力延伸到整个中亚地区,再经过中亚达到中东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西部;从西藏可以将中国的经济辐射力和军事威慑力轻松投射到整个南亚次大陆;从云贵两广一带,则可以与整个东南亚建立密切的经济纽带和交通运输网络。中国国内的战略纵深优势,与外部的双向(海洋和内陆)战略延伸的优势,形成完美的结合和互补,这在世界各国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为中国在21世纪的经济扩展和建立全球影响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当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国力衰弱的时候,如此广袤的疆域和漫长海岸线曾经为国防安全带来沉重负担,招致反反复复的外来冲击

^① 转引自袁伟时:《晚清大变局》,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248页。

和创伤。但一旦中国的国力上升到足以自卫之后,其战略纵深和战略延伸的双重优势,就会成为中国经济全面崛起和走向世界的最强劲支撑。纵观全球,可以说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具有这样的优势。局限于欧洲内陆的德国和困顿于东北亚一隅的日本,一旦国力上升到超过邻国的程度,都必然走上军事扩张的路线,但最终因为资源贫乏和缺乏纵深而成为战败国。美国的東西两岸被浩瀚的大洋所包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搞孤立主义,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国力的衰退,还会回到孤立主义的窠臼。而中国的战略纵深和战略外延优势,注定中国不必靠军事扩张来进一步提升国力和扩大全球影响力。走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道路,是中国的天然选择。

中国的规模优势

首先是地理规模。也就是辽阔的国土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多样性。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集,交通便利,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科技研发能力和高端制造业;中部地区获得东部的辐射,工业化水平紧随其后;西部相对落后,工业化程度也最低。这样的阶梯状分布,虽然产生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但也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中、低端产业互补优势。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淘汰掉的落后设备和所形成的过剩产能,可以通过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得到消化,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所谓“国际大循环”,也就是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的拉动的話,那么,在国际地缘环境和贸易形势骤然变化的情况下,把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国内,利用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经济带之间的发展落差,实现国内大循环,将会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其次是市场规模。直至2023年以前,中国一直拥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在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条件下,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政府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

末采取人口控制措施,也就是一胎化生育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加上外来投资者的刺激和内部体制改革的激发,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带动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伴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全社会的消费力越来越强劲。巨大的人口规模不再是经济负担,而是转变为庞大的消费市场,有力驱动生产的扩张和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国内市场的优势,不仅在其规模之大,足以媲美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或者北美自由贸易区,更在于它的整合程度之高,所有参与这市场的生产者、营销者和消费者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货币,地区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壁垒,整合程度远远超过欧盟或北美自贸区,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吸引了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来华寻找投资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的保护下,庞大的国内市场也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孕育出众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足以与同行业跨国巨头相抗衡的大型企业,这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领域尤为突出。这些企业不仅在国内独占鳌头,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庞大的国内市场是这些企业赖以进行资本积累、形成技术优势并成功走向世界的最重要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内市场的支撑,就不可能出现诸如华为、比亚迪、小米、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等这些最突出的行业巨头。

最后是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大国竞争优势。所谓大国竞争,指的是经济和军事强国之间为建立所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主导优势,形成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区域秩序或世界秩序而展开的争夺。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大国竞争表面上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而军事实力的背后,则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财政能力。财政能力归根到底又是由一个国家的可供汲取的经济资源规模(包括农业剩余、工商税收、金融借贷能力)所决定的。^① 在各项经济资源中,传统农业所产生的经

^①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Charles Till,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0;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14.

济剩余(也就是维持人口生存所需之外的余额)最少,弹性最小,可汲取程度最低。制造业和国内外贸易通过缴纳各种费用所提供的资源,理论上具有无限的扩张潜力,因此在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越来越多地取代并超过来自农业的剩余资源。而扩张性最强的,则是基于银行储蓄、金融借贷和土地升值所带来的巨大融资杠杆,其汲取能力远远超过实体经济,但也最容易形成泡沫,威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如果运用得当,则会使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如虎添翼,对国家的军事能力和国际竞争形成最有力的支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展,也带来实体经济的商品化、资本化和信息化所驱动的非实体经济的急速扩展以及货币发行量的急剧攀升。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汲取能力快速提升。空前增强的财政能力使中国军事装备的升级和国防能力的大幅提高成为可能,使国家有能力提出并逐步实施“一带一路”的倡议,从而增强中国在周边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使得不断向外延伸的国家利益得到加强和保护。大国的竞争优势在此过程中显露无遗。相对于普通中小国家,特别是相对于苏联那样完全依赖实体经济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缺乏财政扩张弹性的传统大国,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国防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国防现代化并未带来严重的财政负担。以2021年为例,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7%,低于法国的1.9%、英国的2.2%、美国的3.5%、俄罗斯的4.1%,也低于中国周边的越南(2.3%)、印度(2.7%)和韩国(2.8%)。^①庞大的经济规模使中国不仅不需要像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工业化后进国那样,通过对外军事扩张、穷兵黩武来提升和巩固国力,而且也无需以牺牲国内民众的消费水平为代价,通过挤占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达到军事扩张的目的。

中国的人力优势

中国的人力资源有两大特征。首先当然是庞大的人口规模所产生的众多劳动力。拥有一只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有各种明显的好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缺乏资金和技术投入的时期,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走劳动密集化的道路,可以有效增加产出,满足国家的汲取需求,但代价是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和劳动者收入的停滞不前。在工业化初期,廉价劳动力的充沛供给,曾经是中国市场赖以吸引外资的重要杠杆,导致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但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仅限于此。随着中国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已然淡去,廉价劳动力的充沛供给已经不再构成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其次,中国人力资源的又一个特征,也是其真正优势,在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几种因素使中国的劳动力素质高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一般水平。第一种因素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尽管家庭背景和关系网络影响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升迁潜力,但中国父母普遍把子女教育视为整个家庭生活的重中之重,把就读排名靠前的学校视为影响日后子女发展前途的关键因素。因此,大多数父母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子女教育创造最好的条件。严重的竞争和升学压力,导致中小学的教学量和课后作业负担增加。这种应试教育不利于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但严格的学校教育也为就业后的劳动技能训练打下扎实的基础。中国工人优异的学习能力和劳动技能,而不仅仅是其劳动力价格低廉,是构成众多跨国公司愿意来华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种有助于增进中国劳动力主体素质的因素,是普通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和整个社会的工作伦理。这里至少有一种“三合一”现象,也就是三种价值观的同时并存,共同塑就中国劳动者群体的总体特性。

其一是中国人普遍把就业,也就是从事生产

^① 以上数据(包括图表中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以截止到2023年6月,更新至2021年的最新数据为准。

劳动,学一门手艺,有一个体面的职业,当作天经地义的事,而不是像很多国家的底层民众,受其历史上的游牧或经商传统的影响,鄙视和规避日常生产劳动,崇尚通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乃至敲诈勒索,达到快速致富的目的,并且把个人的家世背景和社会网络视作决定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不相信后天的教育和个人的努力可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其二是数千年来在农耕文化影响下,普通民众养成了勤勉节俭的天性。秦汉以来的中国农业历来讲求精耕细作,走的是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粗放型农作或中东地区以游牧经商为主的道路。在有限的耕地上,通过增加劳动投入以提高农业产量,同时节省每一粒粮食,精打细算过日子,被普遍视为确保家族生计安全的基本常识。勤劳和节俭是刻在华夏民族骨子里的社会基因,塑造了中国人最基本的劳动态度和生活方式。尽管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渠道已经多样化,年青一代的就业和消费观念也跟过去大不相同,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同龄人,中国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和工作态度依然有着鲜明的特色。愿意为了个人和家庭的长期目标而勤奋工作,节省开支,依然是绝大多数民众包括年轻一代的基本生活态度。

其三是劳动者作为个人在其所属群体中的定位是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个人被置于中心位置,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视为天赋人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类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来自国家或宗教组织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都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对个人的定位恰恰相反。作为家族的一员,个人所受到的尊重和所赋予的权利,只有在家族内部的等级秩序和伦理规范中才能实现。家族之上更有国家或皇朝的权威和意识形态要求,而王朝的合法性又服从于整个宇宙的秩序(天道)和授权(天命)。在“天地君亲师”的道德秩序中,个人的地位是从属性的;个人对家庭的义务以及对朝廷的忠诚,被视为做人的基本要求。服从权威、尊重上级、遵守规章律令,是日常生活的基本

准则。虽然20世纪以来的历次政治和文化革命对上述传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但是集体取向的价值体系依然扎根在中国社会,塑造着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尊重领导、服从上级、遵守规章,依然是全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体现在日常生活劳动上,服从工作场所的规则,为所在单位或团体付出常规要求之外的时间和精力,被视为一种道德追求。这种无偿的付出,尽管不符合劳动法,也违背个人意志,但是在传统的集体取向的文化氛围下,却流行于各行各业,很少遭到员工的公开抵制。

综上所述,重视教育所带来的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农耕文化所孕育的勤勉节俭的生活态度,以及集体取向的价值体系所塑造的非个人中心的行为规范,这三种特性的结合,使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在总体上更能满足现代企业的竞争需求,也是支撑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坚实基础。

中国的体制优势

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起步较早的国家在工商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上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并且能够把自身的财力转化为对外扩张和殖民的武力,只会给他国施加压力,谈不上有赶超他国的紧迫感,因此政府对本国工商业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为日益活跃和趋于复杂的经济活动提供一系列基础性的保障,包括完善各项法律架构,保护产权,规范金融信贷,提供社会福利,化解各方面争端等,但无须直接干预各行各业的经营活动和方向。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对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有着严格的限制和防范意识。

起步晚的经济体要成功赶超的话,则必须有政府的介入,包括引导投资方向的产业政策、市场保护、各种间接或直接的补贴,由此形成流行于战后东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一旦走过了工业化起步阶段,在科技上实现了赶超先进国家的任务,国家便退出经济领域,让位于私有化和民营化。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实践,进一步突破了“发展型国家”的理念。相较于东亚其他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承袭了1949年以后形成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

的经济基础,由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直接拥有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关键企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企业改制,只是带来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所要求的企业所有制形式的部分调整 and 经营形态的变化,而这些核心企业的国有制实质并没有改变;国家依然控制涉及金融、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能源生产、航空航天、国防建设等关键部门,以及全国城市的所有土地资源和全国城乡的其他自然资源。

这些企业的管理体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和由此所产生的弊端,但总体上已经融入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区别于所有欧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后者当然也存在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仅限于公共服务行业,远不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更无法支配各行各业。

这种体制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发挥其特有的优势。首先,不同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下的私营企业,只追求本企业(或者更具体地说企业股东和管理精英)的自身利益,其生产经营仅仅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可以让关键行业的关键企业超出对企业本身利益和短期效益的考虑,在投资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立足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以牺牲个别企业乃至个别部门利益的方式,换取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在欧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法做到的。中国的一系列基础设施上的赶超和突破,包括全国范围的高铁网络、载人航天工程、全球定位系统、全国范围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等,都是这一优势的具体体现。至于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更是这一体制优势的集中发挥,也就是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或者事关国家竞争力的尖端科技和研发,在单个企业无法独自承担、短期内无利可图的情况下,由国家集中财力,重点投入协调各部门人力和物力,制定长远

规划,有步骤地攻坚克难,最终达到既定目标。

再一个体制优势,就是国家层面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充分竞争的市场可以为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提供充沛的动力和肥沃的土壤,但与此同时,企业在竞争中做大做强之后往往形成独占性的利润分配集团或分利联盟,要么通过游说立法机构,形成符合本集团利益的法律法规;要么通过组建卡特尔或其他共谋行为,操纵价格,垄断市场,限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妨碍经济创新,降低经济效率和人均收入水平。^① 反观中国,地方企业的做大做强当然也离不开本地政府的扶持,这些企业在做强之后反过来也会影响政府的投资导向和税收补贴政策,官商之间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企业改制和新经济浪潮中出现了一批超大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垄断行业、操控价格,将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价值不成比例地攫为己有,刻意降低劳动者的所得份额,甚至也会通过各种不合法的方式规避纳税义务。因此,在地方层面,也出现分利集团和分利联盟的苗头,但是在立法层面,尤其是在中央层级的法律法规制订过程,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并不存在分利集团通过游说左右立法的正常渠道和机制。还有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政府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方式,探索最符合实际和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纠错,总体上避免了改革和转制过程中的重大政治动荡;在保持物价相对平稳、社会总体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稳步提升,避免了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大规模社会暴力和流血冲突,以及物价飞涨、腐败现象遍及经济社会每个角落的现象。所有这些,不能不算是中国特色的体制优势下所发生的一个奇迹。

中国 2050:最后一个现代化国家

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均9%的高

^①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速增长时代,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就已经渐告终结,现在更可以说一去难返。就现代化的全过程而言,中国早已越过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粗放式野蛮生长状态,进入罗斯托所说的“走向成熟”(the drive to maturity)阶段。^①经济结构也早已从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和高能耗的低端产业,转型为以中高端产业为主,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也开始退潮。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必然趋势。

然而,为期近4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并不等于说中国经济已经停止增长,更非如同西方个别媒体所声称的正在转向长期衰退乃至崩溃。不同于普通中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依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充沛动力。普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维持本国经济的持续成长,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经济规模有限,对外依存度高,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薄弱,只能屈从于核心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一旦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蛊惑或扛不住西方国家的压力,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和关税保护政策,就会轻易地让来自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占领本国市场,并且将其制造业和服务业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卷走从中所获得的绝大部分利润,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长期处在13000美元以下水平,无从突破13000美元到20000美元这一峡谷,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规模之大,足以形成并且已经建起了比当今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完整的产业链。组成这一产业链的众多产业集群分布全国各地,在生产效率和创新势头上超过世界其他各地的同行经营者,形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竞争力。中国政府的有选择的产业保护政策,也使跨国巨头无法占领国内市场的关键行业 and 关键部门。所有这些,加上中国业已具备的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使中国经济在国家强有力的调控下,不仅可以摆脱跨国公司的支配,形成自我持续的能力,而且在制度和技术创新方面独具优势。从长远角度看,这些优势将支撑中国经济

持续扩张和升级,并且能够保持比普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之所以依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中国的现代化尚处在进行之中,城市化远未结束。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晚至2011年才超过50%,到2022年也仅仅达到65%。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城市人口达到80%以上之后,城市化进程才会减缓。城市化所带来的家庭消费升级和基础建设的扩张,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关键性的拉动作用。如果中国的城市化保持现有速度,估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70%以上,到2035年将进一步达到80%。乐观估计,在城市化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在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应该能够维持在5%至6%之间;在随后的2030—2035年,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将保持在4%至5%之间。中国的人均GDP也将从2021年的12500多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20000美元,从而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如果经济增长受到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的干扰,最晚可能要拖到2035年达到这一目标。

从2035—205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增长势头,但依然能够维持3%到5%的增长率。虽然城市化的驱动作用将大大降低,但其他因素将共同驱动中国经济继续成长,包括前文所讨论的为中国所独有的一系列大国优势。中国的规模优势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完整产业体系和不依赖外部的自我持续能力,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所产生的利润绝大部分留在国内,转化为国民收入。而地缘优势,也就是中国朝欧亚大陆内陆和西太平洋、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两个方向的战略延伸,将会为中国的经济力量的扩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尤其是庞大的人才队伍,与上述规模优势和中国的体制优势结合到一起,将对中国进军高科技领域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如果说在2035年之前,中国在高、尖、新技术的研发上仍将面临核心国家的联手围剿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瓶颈,那么,2035年之后,这种瓶颈的

^①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59-72.

限制效应将越来越小,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将进入喷发阶段,在诸多行业形成全球范围的竞争优势,带动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人口规模将有所缩小,人均 GDP 的增速将超过 GDP 总量的增速。因此,尽管随着现代经济在中国的成熟,经济增长率将会在 2035 年以后降到 5% 以下,但不排除出现由于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势头的加快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提速的可能。到 205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有可能达到 50000 到 60000 美元,从而进入高度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现代化”将走完全程,从此进入“后现代化”时代。

到 2050 年前后,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将具有非凡的意义。在一个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国度实现现代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人类文明的面貌。自从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产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发轫以来,西方列强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实力,几乎支配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也主宰了绝大多数非西方社会。主宰的方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翻新,从最初赤裸裸地抢占海外土地、屠杀原住民,毫不掩饰地实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到霸权国家利用其军事、金融和高科技实力建立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并且借助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为如此形成的世界秩序以及自身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塑造合法性。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欧美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被西方乃至非西方社会的知识精英理所当然地认定为现代社会的标准;所谓“现代化”,实质上只不过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事实也近乎如此。直至中国崛起之前,在整个非西方世界,少数几个业已“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保护和扶持下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它们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

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依赖西方霸权的扶持,并且在摆脱西方霸权支配的基础上,凭借自身力量走完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西方霸权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或解构。但毫无疑问,中国以自身实力和自己的方式所完成的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对自从 19 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的

超越。它将表明,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所体现的“现代性”(modernity)之外,非西方社会有能力在自身历史文化和制度选择的基础上,追寻和形成自己独特的现代性。西方标准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传承,由此所形成的现代性也千姿百态,各有利弊,但一个高度文明、和谐稳定的现代化中国将会向世人显示,西方的现代性不是唯一的选项,甚至也不是最优、最理想的选项。随着中国加入高度发达国家的行列,“现代化”将最终摆脱西方化的阴影,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对所有非西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所有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好的消息是,在现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或许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现代化国家。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都是靠两个最根本的因素:一是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二是自身的潜力和努力。欧美国家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靠的是历史上自身的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以及为现代资本主义生长所不可或缺的信用、法律、会计等基础设施制度。但是如果没有殖民主义和由此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不平等贸易条件,便不可能获得来自外部的大量资源,也不可能有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如果说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中,内部潜质对于起步越早的国家所起的作用越大的话,那么对于起步较晚的国家来说,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往往要超过内部潜质。战后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的现代化,固然受益于自身的儒家文化传统和政府的产业政策,但更主要地还是依赖美国霸权的保护和扶持。21 世纪初欧洲六小国的现代化,则基本上是靠外部因素,即加入欧盟所带来的整合效应。

然而,对绝大多数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 21 世纪的当下实现全社会的现代化,既缺少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不具有足够的内部潜力。首先,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不大,无法形成自成一体的产业链及自我持续的经济体系,结果只能接受现存的由西方核心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求得生存的机会,很难具备向

上突破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国家,不仅高端产业很难发育成长,而且中低端产业部门也往往无法抗拒核心国家的渗透和支配,导致这些行业的大部分利润外流,无法转化为国民财富。因此,只要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依然存在并且起支配作用,普通发展中国家加入发达国家行列就机会渺茫。

同样令人不太乐观的是,这些国家内部的现代化潜质也很薄弱。其中很多国家是在西方殖民帝国崩溃之后人为、匆忙形成的,缺少族群融合的基础。不同族群、宗教团体乃至种姓集团之间的紧张、对立乃至骚乱和内战,严重拖累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传统,尤其是过于强调来世救赎、先天禀赋,贬低后天努力、个人业绩和物质利益等方面,并不利于敬业精神和创业动力的培养。

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有可能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具备了普通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诸多优势。首先是规模和体制优势,使得中国能够摆脱现存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束缚,形成自主、完整的产业体系,具有从中低端向高端推进的能力;其次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造就的人力资源,使中国内地完全摆脱了不同族群、宗教和语言障碍所带来的社会分裂,享受其在其他国家罕见的和谐和稳定,加上劳动者在传统农耕文明氛围中所养成的敬业、勤勉、节俭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造就了最为理想的人文社会环境。

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曾经试图让人们相信,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将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东西,无论大小,都可以依照美国的式样,按部就班地成长

为发达国家。近七十多年绝大多数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对于它们来说仅仅是一个画饼。只要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依然存在,只要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局限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理论已经死亡。

中国的现代化在整个非西方世界将是一个例外。它表明,在不依赖西方霸权的条件下,现代化也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要在这样一个大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自己的规模优势、体制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地缘政治优势。中国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正在于它同时具备所有这些优势。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将向世界展示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理论也将因为中国的成功经验而获得修正和再生。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雄心勃勃的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尚未能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感到惭愧”的话,^①那么,到21世纪中叶,当全社会的高度现代化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凭借独具特色的大国竞争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之时,中国便将完全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施加决定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强权国家所制造的不公平的世界秩序,为增进全人类的和平和福祉做出足以令国人感到自豪的贡献。

作者简介: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潘 清〕

①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时说:“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天,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也就是二零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页)。